

郭毅 胡美琴 王晶莺 刘亦飞 等著

组织与战略管理中的 新制度主义视野

理论评述与中国例证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NEW INSTITUTIONAL VIEW ON
ORGANIZATION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郭毅 胡美琴 王晶莺 刘亦飞 等著

组织与战略管理中的 新制度主义视野

理论评述与中国例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组织与战略管理中的新制度主义视野:理论评述与中国例证/郭毅等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432-1552-8

I. 组… II. 郭… III. 组织管理学-研究 IV. 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3369 号

责任编辑 王 炜

美术编辑 路 静

组织与战略管理中的新制度主义视野

——理论评述与中国例证

郭毅 胡美琴 王晶莺 刘亦飞 等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313,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552-8/F·135
定价 36.00 元

前言

自《管理学的批判力》出版距今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此书在管理学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中得到了正面的反响。就最近的国内管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博士论文来看,中青年学者对组织理论的了解和应用正在逐步展开中,我对此感到欣慰。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对组织理论如此感兴趣。这绝对不是我有社会学的情结,也不是想去赶什么时髦,或者对制度理论有偏爱之嫌(有人称我是 institutional guy)。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组织理论将组织视为一个开放性系统来研究,从而使我们意识到,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才是管理学研究的前提,组织对环境的遵从与组织同构化的过程、形式、内容与机制才是管理学者所要研究的重点,而非现在管理学界主流所遵循的“差异说”。只有这样,管理学科才能走向科学化。这就是说,策略、对策永远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它不具备一般性。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那么管理学不会具有科学性。然而,组织行动策略的来源——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却是可以有根可寻,有因可查。因此,新制度主义为管理学者提供了一个“由一般到具体”的研究途径。

我曾经说过,国际管理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陷于“权变”、“情境”、“本土化”等等情结上而不能自拔,同时全球的人文科学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经典注解式的、概念争辩式的学风转向知识创造和理论建构式的后现代思潮,从而引发了知识的革命,进而对现实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战略管理的前辈——安索夫的思想与这个潮流相符合,即战略来自组织与环境互动的定义。可惜的是,管理学主流并未在此基础上有所进步,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现在,虽然管理学者对经济学家的模型很不服气,但经济学家的理论建构能力明显地强于管理学者,比如,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以及国家竞争战略和优势的学说,其理论建构能力远远大于其对纵段产业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能力。可以说,管理学者的失败源出于此。

无论今天的管理学者在共同演化或复杂性等新方法上如何下工夫,恐怕还是不能超越经济学家,比如上述的迈克尔·波特先生。这又回到了科学学的原点上——知识的科学来自范式化,而范式化最需要演绎式的推导和论证,即所谓的“我思,故我在”。我们管理学者在博士学习阶段,就缺乏较为扎实的理论训练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大家都喜欢向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借来许多方法,博取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在排名较前的管理学术刊物上发表大作。请问如此下去,何以超越经济学家呢?哪里还有“我思,故我在”,只有“我发表,故我在”。

现在我们知道,日本长期雇佣制并不是后人说的是当时的日本企业决策层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美国人在日本推行西方民主,制造出强大的工会,来对抗政府和企业。在此压力下,新一代的日本企业决策层,出于照顾往日一起工作的兄弟姐妹的情感或出于维系其身份地位需要所做出的对员工让步的结果,长期雇佣制随之出笼。实际上,今日的国际管理学术界的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也不完全是什么学术进步的结果。有人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学生造反,学生喜欢闹事而不喜欢读书,学校以往自由自在的学术规范也不再具备约束性,因此需要一

个新的规范,这就是流行了40年的研究实证规范和论文发表制度。今天,出于美国人利益的需要,这套规范和制度又在当时遵循这套规范和标准实践的一流美国学者(请注意,不是现在的一流,而是当时的一流)努力下,向全世界推广,形成了今天人人皆知的国际化的学术规范和标准,也算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想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很多在西方顶尖高校学习和工作过的国人,除了学习和掌握了这套规范和标准之外,更多的是看见,“我思,故我在”的知识创造过程。这就是我说的欧洲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开始部分地为美国人所接受。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美国的顶级学术刊物看到了,那些具有前沿性质的,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学术论文。我认为,这就是件好事!说明管理学开始回归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

现在还是回到新制度主义这个话题上来吧。

应用组织理论于管理学的研究,确实有个转化的过程。比如,在本书中,胡美琴老师将合法性、资源基础和战略选择等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管理学意义的研究途径。这就是说,管理学者要遵从的是组织理论的思想,因为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结晶,是优秀中外哲理在当代的传承与体现。同时管理学者还要将它与其他理论或学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适应管理学研究的特定需要。

20多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社会网和种群生态等组织理论的新学说为社会科学界有关学科所接受,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在丰富化。在管理学界,将组织理论和传统的管理理论相结合,社会化、制度化和关系化的层面因素被吸收到管理学的学术研究中,使管理学界有可能直面那个在全世界一直在争执不休的问题——管理的“情境导向”和“本土化”。对于中国管理学者来说,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压力以及组织的回应之间的关系,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

本书是笔者继《管理学的批判力》之后的第二本有关组织管理的研究专著,其重心是:管理学的新制度主义视野:理论概述和中

国例证。本书除了概述篇和竞争篇是对新制度主义理论及其应用的概述之外,其余均为对中国组织管理现实问题的实证性分析和讨论,包括,组织合法性的来源及其机制、组织变革的演化机制与发展战略、外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演进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等专题。

本文集的专题研究,均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概述篇作者是郭毅、徐莹和陈欣,竞争篇作者是郭毅、王晶莺,认同篇作者是郭毅、忻锋光,代工篇作者是郭毅、王晶莺,变革篇作者是郭毅和刘亦飞,生态篇作者是胡美琴。这只是对新制度主义在组织与战略研究中初步探讨的结果。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加入进来,也希望能得到国内同仁的积极响应和批评指正。

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来体现中国社会中的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特征,为中国组织管理研究做出我们的努力!

郭 毅

2008年5月

目 录

概述篇

新制度主义

- 由组织概念争辩转向对客观存在的阐释 3
- 一、早期的制度研究 3
- 二、新制度主义研究 10
- 三、新制度主义对组织理论的贡献 18
- 四、结束语 38

竞争篇

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构建与维系

- 战略管理研究中的新制度视野 57
- 一、战略管理研究的误区 57
- 二、新制度主义与战略管理 58
- 三、非市场战略 70
- 四、制度变迁 79
- 五、新行业组织合法性战略的构建 86
- 六、组织形式的构建战略 90
- 七、企业跨国投资战略 96
- 八、组织信任机制的构建 102
- 九、小结 107
- 十、战略管理理论的创新 108

认同篇

组织认同优势的获取、维系和流失

- 以温州服装商会为例(1996—2004年) 127
- 一、概念讨论、研究目的和方法 129
- 二、回顾与评述 133
- 三、组织认同:关于温州商会的分析模型 141
- 四、案例:温州市服装商会的组织认同 150
- 五、总结 165

代工篇

国际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关系的构建

——基于 M 公司的案例研究 177

一、引言 177

二、文献评述 178

三、分析框架与命题提出 183

四、研究对象与方法 188

五、案例分析 189

六、讨论 212

变革篇

基于组织惯习为基础的组织变革研究 221

一、组织研究的适应视角与选择视角 221

二、管理理论中的组织变革 224

三、组织生态学中的组织变革 236

四、演化经济学中的组织变革与组织进化 244

五、组织惯习与组织变革——一个整合框架 249

六、惯习的力量

——对联想企业的二手资料研究 255

生态篇

在华跨国公司生态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研究 269

一、导论 269

二、企业生态环境管理研究综述 273

三、理论模型与假设 325

四、主要理论贡献及启示 327

后记 349



新制度主义

——由组织概念争辩转向对客观存在的阐释

□ 郭毅 徐莹 陈欣

制度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制度研究最早可以追随到 19 世纪。在 10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制度研究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制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中期之前是早期的制度研究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的组织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由此拉开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序幕。

一、早期的制度研究

制度研究萌芽于 19 世纪晚期。早期的制度研究与现在的研究在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却是目前制度研究的鼻祖,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早期的制度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三个学科领域,下面我们根据学科分别对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中叶的早期制度研究的发展状况作简要概述。

(一) 经济学中的旧制度主义

经济学的旧制度主义与后来发展的由 Coase、North 倡导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可以说是迥然不同,关于经济学的旧制度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晚期的德国和奥地利,许多经济学家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romantic movement)以及 Kant 和 Hegel 的理论汲取灵感,当时学术界最大的争论就是质疑经济学是否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普遍的

规律。以 Gustav Schmoller 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经济研究应该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内进行,而社会环境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活动。因此,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研究所必需的。此外,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学应该放弃简单的“经济人”假设,而采用更为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与此相对应,以维也纳经济学家 Carl Menger 为代表的学派,是传统研究方法的捍卫者。强调经济学中简单假设的有用性,以及发展抽象的、恒久的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但是这个学派同样认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需要理论的解释。Langlois(1986)认为,Menger 在旧制度主义学家中更倾向于一个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简言之,历史学派和 Menger 学派对经济学的方法论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但是没有一方最终能够说法对方。

后来,历史学派的许多观点被一批美国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接受过德国的教育。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出现了三位极具影响力的制度经济学家,他们是 Thorstein Veblen、John Commons 以及 Westley Mitchell(Scott, 2001)。

Thorstein Veblen 的《有闲阶级论》(1899)、《企业论》(1904)等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反对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前提,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Veblen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制度:一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产权);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机器利用引导出工厂制度、大规模生产、信用制度等一系列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制度变革,其目的是无限制的商品生产。“企业经营”则通过资本的投资,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进行组织控制,其目的与“机器利用”不同,不是产量最大化,而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由于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服务的不同目的,Veblen 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弊端的根源。

Thorstein Veblen 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 John Commons 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John Commons 把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

益冲突,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他强调经济的、法律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

Westley Mitchell 将 Thorstein Veblen 的制度研究同经济周期分析结合起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看做货币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他所谓的商业循环。

综上所述,虽然三人的观点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批判了传统经济模型的非现实性,并且都主张应该采用历史的、演进的观点来研究经济现象。除了德国历史学派,早期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受到了本土实用主义哲学家 Dewey、James 等理论的影响。他们对于抽象的普遍原理产生怀疑,开始热衷于解决实际问题,并且意识到了随机事件与历史结合的重要性。

Jacoby(1990)指出,早期的制度经济学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显著差异:首先是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传统经济模型研究的是一种均衡状态,而制度学家强调的是不确定性;其次是偏好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偏好与需求是内生的,而制度学家则认为人是制度人,个人的偏好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而被型构;再次是简化假设与行为的现实性,传统的经济学采用功利主义的简化假设,而制度学家则使用实际的现实的行为模型;最后是即时性分析与历史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的是与时间和地点无关的假设,而制度学家则认为经济现象会随着实际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

事实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取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位置,当然也有少数的经济学家坚持运用制度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其中包括 J. A. Schumpeter、Karl Polanyi、John Kenneth Galbraith 以及 Gunnar Myrdal(Swedberg, 1991)。Scott(2001)认为,早期的制度经济学之所以难以被广泛认同,主要存在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德国历史学派过分强调经济系统的独特性,从而低估了分析性研究的价值;二是早期的制度经济研

究方法退化成了单纯的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

(二) 政治学中的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 20 年,制度研究方法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科学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最为著名的学者有 Burgess、Wilson 以及 Willoughby。政治学的旧制度主义主要源自于以下四个原理:

律法主义:这个方向主要研究法律以及法律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法国,出现了法律制度学派,它试图建立更为实证的法律研究方法。它认为,法律是人类的产品,但它同时也是经验的现实,表达着通过制度方式产生的选择。另外 Oliver Wendell Holmes(1909)对习惯法产生的背景和运作方式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习惯法是进化的,同时也是制度的。

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倾向于关注政治体系主要的制度特征,比如它们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等等。结构主义几乎没有为个人影响留下任何空间,排除了那些历史巨人从政府内部对事件过程的影响,所以假如结构主义者能够辨别结构的显著特征,他就能对系统行为做出预测。

整体主义:整体主义者倾向于对整个系统进行比较,而不是对像立法机构这样的单个机构进行考察。

历史主义:历史主义者的分析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他们关注的是当代政治体系是如何嵌入到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现实中去。其潜在结论是:为了彻底了解特定国家的政治实践,研究者就必须了解使政治系统得以产生的发展模式。此外,个人行为(或精英行为)只是集体历史及其理解历史影响政治的意义的一种功能。

旧制度主义是学术研究中丰富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旧制度学派仍然有许多明显的不足,譬如旧制度主义总是从宏观整体开始进行分析,它使概括和理论建构显得极为困难,而且旧制度主义者在其分析中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规范因素,将个人价值观融入研究过程中将大大不利于对事实的阐述,从实证意义上来讲,旧制度主义者的研究并不科学。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60 年代,行为学研究方法取代

了传统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制度学研究的重点,这一趋势使得规范分析不再是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行为主义者试图将政治科学重建成为一门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科学(Easton, 1965),他们认为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形成一种总体的、内在一致的论述,从而对各种背景中的现象进行解释。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行为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政治制度学家们的关注焦点从制度构建转为政治性行为,例如投票行为、政党形成以及大众意见等。而将行为视为是一系列自我利益的产物的功利主义思想更是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开始以一个工具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认为政治家关注的核心是资源,而政治行为就是资源的分配(March and Olson, 1984)。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兴起的“理性革命”(rational revolution)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制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处于政治场景中的行为者才是个人,因此政治研究唯一合适的目标就是个人及其行为。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经济学假设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这一方法的引入可以说是使得政治科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正如 Peters(1999)所指出的,行为主义与理性主义使得政治学研究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强调严密的演绎的研究方法;二是对于规范的说明性的方法的偏见;三是以个人为研究对象,假设个人行为的动机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四是强调投入机制。

虽然,行为主义在构建科学的政治学科构架方面贡献很大,但是其理论也有它过于极端的一面,它总是假设制度只是制度中的个人在集体层面表达其偏好的手段,对制度在塑造制度参与者偏好方面具有的作用予以否认,对制度参与者来说,制度似乎是外在的和预先决定的,而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并遭到了其后新制度主义者的强烈抨击。

(三) 社会学中的早期制度研究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社会学家对于制度的关注程度远高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制度研究者。现代社会学的前驱 Durkheim 甚至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的科学,定义经济学为关于市场的科学。社会学中的早期制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有

些学者强调制度的功能性作用,另一些学者强调制度与个人的相互依赖与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将各方观点进行融合,最后一类学者重视象征性系统的意义。

以 Spency 和 Sumner 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强调制度的功能性作用。Spency 是 20 世纪社会学领域内最重要的制度学家之一。其认为制度是一个根据时间演化的有机系统,这一定义广泛地为主流社会学家所采用。Spency 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对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试图通过不同社会中制度的对比和比较来勾画出制度发展的普遍性规律(Scott, 2001)。Sumner 继承和发展了 Spency 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成果。他认为,制度是由观念和结构组成的,观念定义了制度的目的和功能;而结构则包含了制度的意义以及手段。Sumner 认为,社会演进的过程就是从个人行为到社会习俗,再到规范,最后达到完善的制度。制度可以是随着时间缓慢演化而形成的,也可以通过理性行为而颁布(Sumner, 1906)。后来的社会学家抛弃了 Spency 和 Sumner 所采取的生物的演化的分析逻辑,但是他们仍然将制度视为社会的中心。Davis (1949)将制度定义为是围绕一个或多个功能所建立的一套习俗、规则 and 法律的混合物,并且其认为用制度的概念来传递部分的规范性规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从 Spency 和 Sumner 到 David 的研究虽然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从功能性角度来定义制度的,都将制度视为是一个功能性的特定范围。当代学者 Frielland 和 Alford(1991)继承了早期的理论,并且强调多元的、差异化的、部分制度范围冲突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

以 Cooley 和 Hughes 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强调制度与个人的相互依赖作用。Cooley 认为,个人与制度、制度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依赖性。虽然大量的制度,例如语言、政府、教堂、法律以及习俗是独立于个人行为的,但是他们是通过与个人的互动而发展和维持的(Cooley, 1902)。Hughes 继承和发展了相互依赖模型,将制度定义为是一个已经建立的关于明确社会方式的永久关系(Hughes, 1936)。他指出,虽然制度代表着一贯和稳定,但是只有当个人推进这一制度安排时其才能够存在。在其大部分的研究中,Hughes 关注的是制度结构对于个人行为,尤其是个人职业的影响和支持(Hughes, 1958)。